

一座山的高度

——《大同》之十三

侯建臣

人可能已经不在，但山会在。

世间虽然没有永恒，但与人相比，山应该算是永恒的。

比如北方的那座叫“方山”的山。

“由雷公山迤北而东曰方山，南距府治五十里，高三里，盘踞三十里，一峰壁立，巖有北魏诸陵，俗传祁皇墓。其左，如浑水北来径之。《水经注》：如浑水流径方岭，上有文明后陵，陵之东北有高祖陵，二陵之南有永固堂。《魏书》：太和元年于方山建思远寺，三年起文石室、灵泉殿，五年建永固石室，旧志所谓方宫遗址也。明嘉靖十八年总督毛伯温所筑镇边、镇川、宏赐、镇河、镇鲁分布山麓。”（清吴辅宏纂辑《大同府志》）

方山不大，如果与那些名山大川相比，既不险峻，又不耸峙，只能算是一个略高出周边的高地。然而方山之高，却因其与历史上的一个人物有关。

文明皇后，是其皇后人们为她命名的称号。翻阅史书，她竟没有名字，哪怕一个小名。路边的随便一朵小花，尚有名字，她没有。好在，人们不称她文明太后的时候，会叫她冯太后。这样，没有名字的她，终是有来处的，太后只是一个称谓，就像一个家庭里的婢婢、伯母、王家媳妇……但姓，是实实在在的。

那个乱世，人人都有当皇帝的想法，也确实有，好多人不久前还是草莽无赖，睡了一觉之后，就成了有军队、宫室、地盘的大爷。因了这可能性，没当皇帝的，想着当；当了皇帝的，心惊胆战，时刻防着。因了那个至上的皇位，儿弑父、弟杀兄、臣弑君、君杀将的事比比皆是。冯跋就是在皇帝之争中胜出

的一位，他在辅助偏安于北方的慕容燕的时候，瞅准了机会，自己称王，仍以“燕”名，后人称为北燕。到第二世冯弘，北魏加紧了收拾北方小国的进程，没过多久，此“燕”便折翅沉泥，成为过往。这没有名字的冯氏女子，没有享受过皇族血统的好处，便随了投靠北魏的父亲，到边远的西北地区生活。作为一个地方官，想来他们在西北边陲过得也还不算太差。但世事多变，哪料一夜之间或者顷刻之间，死的死了，做奴隶的做了奴隶。还好，被贬入皇家做了奴仆的冯氏女子，遇到了她的姑姑，太武帝的一位妃子，从此如一株夹在墙缝里的小草，慢慢地长大，且做了皇孙拓跋濬的女人。而这个拓跋濬，在宫廷变故中，早早就做了皇帝。但这个皇帝当得早，死得也早。

铸金成人，跃身皇后。是偶然，还是做了精心准备？

赴火祭夫，赢得敬重。是演戏，还是真情流露？

刚刚二十出头的她，孤儿寡母被架在权力的巅峰上，四处都是虎狼的眼睛，在无奈与不甘中，最终奋然一击，成为一场博弈的胜出者。过程是惊险的，这惊险也让一个人的血开始变冷，心开始变硬，斗志也异乎寻常地强了起来。

此时，她已经不需要名字。

临朝辅助年幼的小皇帝，她已经是人们眼中的一堵厚重的墙，没有谁敢轻易动她一下。

小皇帝也有长大的时候，没有谁愿意让别人掌控一生，皇帝更是。她与她扶持起来的那个皇帝越走越远。一个走

到生命的终点，一个走向欲望的前方。

孙子，依然可以成为她的一枚棋子。只要棋盘在她的手里，她是能够也必然要把他掌控在手里的。让一枚棋子走出自己的步子，自然是操棋手不愿意看到的。儿子皇帝在位的时候，她是太后，那么孙子皇帝上来了，她算什么？太太后？太后勤？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是一个出色的棋手，因为在之前与许多人的对决中，她胜利了。一次次的胜利，让她积累起越来越多的资本。

而这些资本，让她垒起了中国历史书中的一个小高度——太和改制。

她知道，每个人都需要在脑子里装些东西，便倡导各地兴办乡学。

她知道，官员都需要在脑子里装些东西，便倡导各地兴办乡学。

她知道，官员义务劳动不合乎常理，靠掠夺、贪污终究不是治官治吏之道，于是确立了班禄制。

她知道，地方豪族各自为政，不利于中央集权的管理，宗主督护制一定会影响魏政权的稳固，于是实施了“三长制”。

她知道，广阔土地上的田亩不公，无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且会让生活在北魏土地上的民众贫富过分悬殊，于是颁布了均田令。

这些做法，是开创性的。像是地上的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她迈开了步子，走出了第一步，于是她的身后便有了一条长长的路，若干年后，还有人在走。

就是这个没有留下名字的女性，总是能超出异于常人的事情。生前，她所走的路，是自己的。死后，她依然给自

己划了一条独特的轨迹。作为一个女性，她之前的大多数女性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都是男性的依附物，她之后的大多数女性，也是。而她，没有选择与其夫归葬在一起，而是早早就为自己选择了一座山，选择了一个王国，成为一座至今屹立的“永固”之陵。

坟墓，是一个人留给这个世界的记忆。

它埋葬一个人，又留住一个人。

曾经有人写过两句诗：成功是成功者的通行证，失败是失败者的墓志铭。其实，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所有的存在，共同的终点，是死亡；共同的归宿，是坟墓。

世间没有留下的，坟墓留下了。时间没有留下的，一座山留下了。

云中北顾是方山，永固名陵阅玉颜。艳骨已消黄壤下，荒坟犹在翠微间。春深岩畔花争放，秋尽祠前草自斑。欲吊香魂何处问？古碑零落水潺湲。

方山，是一座一眼就能看出高度的山，但因为上面安葬着一位不同寻常的女性，让人们总无法说出它的高度。当人们站在山前仰望那座坟墓的时候，当人们走在博物馆里注目那些遗物的时候，总忍不住会想起那位没有名字、却让自己的名声响彻古今的女性——文明太后！



公元1620年，时于户部任职的诗人吴伯与来大同游览云冈石窟，并把自己的两首诗作镌刻在石碑上，这通碑有幸一直保留到今日。估计是在同一年更早些的秋天里，吴氏还登上大同城最雄壮的西北角楼——乾楼，在楼上畅饮之后，留下一首七律，其诗如下：

秋日饮乾楼

明·吴伯与

危楼坐倚暑犹寒，千仞高墉绝壁盘。山绕塞垣分队出，树开营垒接穹宽。铙歌风转边庭静，楼客星移幕府看。乘兴夸雠吾作赋，谈兵谁是旧登坛？

这首诗后来被收录到清代乾隆《大同府志》中，故而喜欢大同文史的后人们都能轻而易举地读到。可惜的是，后人把他的名字搞错，写成了“吴伯兴”，原因也很简单，“与”的繁体作“與”，与“兴”字的繁体“興”十分相近。诗题为《秋日饮乾楼》，短短五字，交代清了三大要素：时间为秋天，地点则在大同城西北角之乾楼，事件是饮宴。

首句“危楼坐倚暑犹寒，千仞高墉绝壁盘”，极言大同城西北角乾楼之高峻。意思是说，倚坐在乾楼之上，由于这楼实在是太高了，以至于虽然还在暑季让人竟能生出寒意。诗人就是诗人，除了“危”“千仞”“高墉”“绝壁”这些词之外，“暑犹寒”更见功夫，因为写得更为含蓄，而不是直说。其中“危楼”一词也很妙，试想：高楼为什么称“危”？一定是因为人处于极高之处必

然会心生恐惧感。由此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北魏地理学家酈道元的名作《水经注》中那句“危楼倾座，恒有落势”。（《水经注·沮水》）更多的人可能想到的是更为今人熟知的“诗仙”李白的那首五绝：“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唐·李白《夜宿山寺》）句中“危楼坐倚”四字在今人看来其实是倒装的，正常的语序是：坐倚危楼。全句甚至全诗最难理解的应该首推那个“盘”字，笔者玩味再三，以为此字的意思是垒、砌，以砖木建造，如盘炕、盘灶。所以本句是说巍峨高耸的乾楼似是建造在看上去有千仞之高的绝壁之上。

颌联“山绕塞垣分队出，树开营垒接穹宽”，写于楼上所见大同城之景。上句说大同城外多山，群山环绕着大同城的城墙仿佛有整齐的队列；下句说大同郊外多有军队驻扎：树林间的开阔处可以看见诸多营盘。由大同城西望，北望确实多山，城北不远处现存地名“东营盘”“西营盘”“操场城”等，可见所写之景不虚。“塞垣”本指汉代为抵御鲜卑所设的边塞，后亦指长城或边关的城墙，本诗中指大同城的城墙。唐人崔湜曾作《塞垣行》，唐末诗人刘兼《早秋游湖上亭》诗中有“摇落江天万木空，雁行斜戛塞垣风”。北宋政治家欧阳修曾作《时论·塞垣》，另一位同时代政治家有诗云，“乘日塞垣人，御风塘路归。”（北宋·王安石《乘日》）“营垒”则是指军营和四周的围墙。“郊”指城外不太远的区域。“郊，距国百里为郊。”（东汉·许慎《说文解

字》）这里说的是本义，周时距离国都五十里的地方叫近郊，百里的地方叫远郊。后泛指城外周边的地区。

颈联是“铙歌风转边庭静，楼客星移幕府看”，上句说遇到承平时节，下句则联想到边关的将帅。全句说，斗转星移，时间已经不早了，塞风吹过来的军乐声显示出边境的宁靖，我这个久有游仙之志的“楼客”目光不由得转向了将军的府邸。“铙歌”原本指军中乐歌，传说为黄帝命岐伯所作。汉乐府中则属鼓吹曲，于马上奏之，用以激励士气，也用于大驾出行和宴享功臣以及奏凯班师。“楼客”的本义是指乘楼泛游天河之人，在此诗中则系作者的自称、自喻，因为绝大多数中国古人代文都有游仙的志向或归隐的意愿。要想搞懂“楼客”一词，必须先知道西晋人张华在其笔记《博物志》中记载的一个故事，“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资粮，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茫茫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广。遥望宫中有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此人到天河时也。”“星移”的本义是指天上星辰的移动，比喻时光的变化。常见成语即有：物换星移、星移斗转、星移漏转等。“幕府”是古时将帅办公的地方，后

也泛指衙署。古人早期有时候也写作“莫府”，如《史记》有“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西汉·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又见于《李将军列传》：“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

结尾“乘兴夸雠吾作赋，谈兵谁是旧登坛”，乘着酒兴，诗人我在所作的诗中不免自夸其能，随后畅谈兵法韬略，问大家在座的哪位是曾得到筑坛拜将荣誉的老将。“夸雠”是夸赞自己出色、强大。需要专作说明的是“赋”字，赋本为中国古代以“颂美”和“讽喻”为目的，讲究文采、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性质的一种有韵文体。最早出现于诸子散文中的叫“短赋”，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体”叫“骚赋”，魏晋以后逐渐向骈体发展的叫“骈赋”，唐代又转为律体称“律赋”，宋代用散文的形式作赋称“文赋”。历史上著名的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杜牧的《阿房宫赋》、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赤壁赋》等。此处泛指一切诗文，作者未必在此诗之外真的另作了一篇赋。“谈兵”是指议论军事，谈论用兵。“旧登坛”是指老将。因为汉代有“登坛拜将”的故事，《史记》卷九十二记载汉王刘邦择日斋戒，设立坛场，以隆重的礼节拜韩信为大将，故而后世以“登坛”喻指拜将。

作者不愧为一代名诗人，全诗虽然多为实景的记录与描写，但只结尾那一句虚写，就给读者开拓出大片的想象空间，让人回味无穷，全诗也顿时产生了余音袅袅、绕梁三日之感。

太和？太𡗗？

杨刚

行走在大同市区，可以看到不少以北魏年号命名的街道、小区、建筑、店家等，确实给人以历史感和文化味，也和大同的大古都、历史文化名城等荣衔相匹配。例如以“太和”命名的大街和住宅区确实有恢弘气象。同时也有商家使用“太𡗗”之名，猜想商家或设计师亦是出于文化考量。

无论是“太和”还是“太𡗗”，在大同显然都指向了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年号。大同在公元398年到公元494年之间曾经是北魏的都城，那时叫平城。北魏平城时代的孝文帝拓跋宏（元宏）从公元477年开始使用年号“太和”，直至迁都洛阳后的公元499年。

北魏太和年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政策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孝文帝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均田制、三长制等一系列重要改革，史称“太和改制”。这些改革的目的是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调整，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各民族的和谐共处。年号“太和”恰恰也是孝文帝这些政治理念的体现。

中国的汉字有简体字、繁体字，还有异体字、通假字等。城市里既有“太和”又有“太𡗗”，于是就有人问“太和”“太𡗗”有区别吗？如果有区别的话应该使用哪一个？

查阅历史资料，确实存在“太和”“太𡗗”两种写法，但大多数文献记载为“太和”，只是在某些特定场合或版本中也出现了“太𡗗”的写法。这一差异也曾引发历史研究者的关注。

在正史记载中，北魏孝文帝的年号明确写作“太和”。《魏书·高祖纪》记载：“太和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诏曰：‘朕夙承宝业，惧不堪荷，而天貺具臻，地瑞并应，风和气暖，天人交协。岂朕冲昧所能致哉？实赖神祇七庙降福之助。今三正告初，祗感交切，宜因阳始，协典革元，其改今号为太和元年。’”这一诏书明确记载了孝文帝改元为“太和”的决定，成为最权威的历史依据。

《魏书·高祖纪》还详细记载了孝文帝在位期间使用“太和”年号的各个年份及重大事件。例如：“太和元年十一月丁亥，怀州民伊祁苟初自称尧后应王，聚众于重山。洛州刺史冯熙讨灭之。”类似的记载在《魏书·高祖纪》中出现多达数百次，涉及太和元年至太和二十三年的各个年份，形成了完整的时间序列。

其实在《魏书》之外，其他重要历史文献如《北史》《资治通鉴》等也都采用“太和”的写法。《资治通鉴》为清晰呈现南北并立的时间线，对“太和”年号的使用采取“主记北魏事则用太和，主记南朝事则注太和”的方式。例如，“太和十七年，魏主以平城地寒……议迁都洛阳”（《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九》）。

在历史研究中，学者们也普遍采用“太和”这一写法。例如，黄瑶在《史时抵牾与编纂成书——〈魏书·显祖纪〉书写过程考论》一文中，详细讨论了《魏书·显祖纪》与《魏书·高祖纪》在记录和平六年至延兴年间史事时的抵牾之处，但始终使用“太和”年号。这表明在学术研究领域，“太和”已成为公认的标准写法。

在纸质文献之外，北魏时期的碑刻实物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年号实证。北魏时期留下了大量碑刻，这些碑刻是研究当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通过对这些碑刻的考察，可以直观地了解当时年号的实际用法。

出土于大同的重要墓志《司马金龙墓志铭》是北魏太和八年文物，铭文记载：“大代太和八年岁在甲子十一月庚午朔十六日乙酉，怀州河内郡温县肥乡孝敬里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吏部尚书羽真司空冀州刺史琅邪康王司马金龙之铭”。墓志中明确使用的是“太和”年号。

《始平公造像记》全称《比丘慧成为亡父洛州刺史始平公造像题记》，孟达撰文，朱义章楷书，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8）九月刻，石在河南洛阳龙门山古阳洞北壁，是龙门造像名品之一。碑文中明确使用“太和”年号，如“太和廿二年九月十四日讫”。

《吊比干文》又称《皇帝吊殷比干文》或《北魏孝文帝吊比干墓文》，刻于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十一月，故又名《太和碑》。原碑已毁，北宋元祐五年（1090）吴处厚民间所存拓本重新立石摹刻，现存河南省卫辉市顿坊店乡比干庙。碑文中明确使用“太和”年号。

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晖福寺碑》，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二年（488）立，篆额题“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九字。碑文记载：“太和十二

年七月，王遇在其家乡冯翊（今陕西大荔县）李润镇……”

刻于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区第五窟内侧石壁上的《元景造像记》是营州刺史平东将军元景为孝文帝撰灾祈福，于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初八日所刻。碑文记载：“太和廿三年四月八日，营州刺史平东将军元景为孝文皇帝……”

通过对这些碑刻的考察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在北魏时期的实际使用中，孝文帝的年号写作“太和”，而非“太𡗗”。这些碑刻跨越太和年间的不同年份，分布于不同地区，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充分证明“太和”是当时官方和民间普遍使用的标准写法。

从文字学的角度探析一下“和”“𡗗”两字的字形演变与关系，有助于我们认识“太和”与“太𡗗”。“𡗗”是“和”的古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和金文中。《说文解字》中解释：“𡗗，调也。从龠丩声。”“和”则解释为：“相应也。从口禾声。”段玉裁注释：“经传多借和为𡗗。”这说明在古代文献中，“和”常被借用来表示“𡗗”的意思。

在字形演变过程中，“𡗗”“和”逐渐分化。“𡗗”最初主要表示音乐和谐，后来引申为调和、和谐等义；而“和”则更多表示声音相应、和谐等义。随着时间推移，“和”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涵盖了“𡗗”的大部分意义，“𡗗”则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并成为一个异体字。

到了北魏时期，汉字使用已经趋于规范化，官方文书和重要碑刻通常采用当时的标准字体。从现存

的北魏碑刻和文献来看，“和”字的使用频率远高于“𡗗”字，这表明在当时的实际应用中，“和”已经成为主流写法。

尤其是在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的背景下，官方用字更加注重规范化和标准化。孝文帝对汉文化有深厚造诣，他主导的太和改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其中也包括语言文字的规范。在这种背景下，官方年号使用标准的“和”字而非古体的“𡗗”字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在后世文献中，特别是在一些仿古或注重文字学的著作中，有时会使用“𡗗”字来表示和谐、调和等义。这种现象可能导致后世对北魏年号写法产生混淆。例如，一些书法或篆刻作品为了追求古雅效果，作者可能会使用“𡗗”字而非“和”字。这种情况在明清时期尤为常见。这是后世的用字习惯，很显然不能据此推断北魏时期的实际写法。

另外，从文化角度看，“太和”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太和”一词最早见于《易·乾·象》：“保合太和，乃利贞。”意思是保持宇宙间的和谐关系，才能有利于万物的正常发展。“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强调和谐、协调、平衡。“太和”年号的使用体现的正是孝文帝对汉族文化的认同和推崇，希望通过文化融合实现民族和谐的政治抱负。事实上，太和年间北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总体上较为和睦，北魏也从一个以游牧为主的鲜卑政权逐渐转变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王朝。

造成“太和”“太𡗗”差异的原因有多种，其一就是版本差异与传抄错误。文献在流传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版本差异和传抄错误。北魏时期的原始文献大多已经失传，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后世的抄本或刻本。在传抄过程中，抄写者可能因为字形相似或理解不同而误将“和”写作“𡗗”，或者相反。特别是在一些非官方或非主流的版本中更容易出现。

其次，为了追求艺术效果，古代一些书法家使用了“𡗗”字而非“和”字。这种写法上的差异也会导致后世对年号写法产生误解。再次，北魏疆域广阔，不同地区可能存在语言和文字使用上的差异，有人或许习惯使用“𡗗”字而非“和”字。这种地域差异在当时的官方文书中可能不明显，但在民间文献或地方碑刻中可能有所体现。此外，北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在使用汉字时可能存在一些特殊习惯，这也可能导致年号写法出现差异。后世学者在研究北魏历史时，可能因为对当时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了解不够全面，或受到个人学术观点的影响，从而对年号写法产生误解或误判。

研究历史，需要尊重历史事实，以可靠的文献和实物证据为依据，避免因文字演变或后世误解而对历史事实产生误判。同时，需要注意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在理解历史文献时要考虑到当时的语言环境和使用习惯，避免用后世的标准去衡量古代的语言现象。